

愛新覺羅毓鋆春秋學與易學的會通

黃忠天*

摘要

《大易》與《春秋》相表裡，二經為中華傳統經典精華之所在，為毓師生前所看重者。《毓老師說易經·序》說：「奉元兩部書：《大易》與《春秋》。《大易》與《春秋》弄通，中國思想絕對左右逢源。」所以，兩部書向來是奉元書院講授的主經。《大易》由隱以之顯，《春秋》由顯以之隱，其表達方式雖有不同，然體用不二，殊途同歸，其中可藉以相發會通者尤多。因此，毓師生前講授《春秋》，每每援引《大易》以相佐證。茲就其中較著者，歸納如下：

其一：《春秋》始元與《大易》始元。其二：《春秋》書法與《大易》時義。其三：《春秋》正名與《大易》中正。其四：天人符瑞與群龍無首。其五《春秋》二端與太極兩儀。毓師在講課時，透過《大易》與《春秋》兩經的會通，使得兩經旨義，能達到深切著明，相觀而善之效，也使我們藉此瞭解奉元書院所奉所宗所學者為何事？

關鍵詞：愛新覺羅毓鋆、奉元、春秋、易經、經學

*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兼任教授

The fusion of *Spring and Autumn* learning and *I Ching* learning in Aixinjue Luo Yujun's lecture

Huang Chung-Tian*

Abstract

The two classics *I Ching* and *Spring and Autumn* are the ess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lassics, and they are also the books that Teacher Yu most valued before his death. Therefore, the two books have always been the main books read by Fengyuan Academy. Although they are different in nature, there are many places where they can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Therefore, when Teacher Yu teaches *Spring and Autumn* and *I Ching*, he often quotes and compares with each other. The most important one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First: The first character "Yuan" in *Spring and Autumn* and *I Ching*. Second: The meaning of time in *Spring and Autumn* and *I Ching*. Third: *Spring and Autumn* and *I Ching* are both emphasized on justice. Four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e and humans. Fifth: The two extremes of *Spring and Autumn* and *I Ching*. During the lecture, Teacher Yu clarified the meaning of the two classics through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I Ching* and *Spring and Autumn*. Through this article, we can understand the core which Fengyuan Academy focused on.

Keywords: Teacher Yu, Fengyuan Academy, *I Ching*, *Spring and Autumn*, Classics

*Adjunc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壹、前言

《大易》¹與《春秋》二經為中華傳統經典精華之所在，向為毓師生前所看重者，亦為奉元書院講授的主經。《毓老師說易經·序》曾引用毓師的說法：「奉元兩部書：《大易》與《春秋》。《大易》與《春秋》弄通，中國思想絕對左右逢源。」²

《大易》由隱以之顯，藉由辭變象占，來表達卦爻的旨義。《春秋》則是由顯以之隱，藉由顯明的史事，來表達孔子所寄寓的微言大義。毓師曾說：「《易》為五經之源，《春秋》為孔子之志。」³孔子之志者何？一言以蔽之，即在「奉元」而已。《大易》體元、《春秋》奉元，其表達方式雖有不同，然兩者體用不二，殊途同歸。其中可藉以相發會通者尤多。例如：《春秋》始元與《大易》始元、《春秋》書法與《大易》時義、《春秋》正名與《大易》中正、天人符瑞與群龍無首、《春秋》二端與太極兩儀等等，透過上述關係的探討，兩經旨義，更可藉此達到深切著明，相觀而善的效果。

毓師為前清皇族，自幼接受宮廷教育，其易學根柢是以程朱易學為主的清代宮廷易學。他曾說過：「讀《易》必從王弼《周易注》、程子《易程傳》、王夫之《船山易傳》三本代表注看。有思想了，就可以發揮自己的思想。」⁴自1947年由南京移往臺灣監管後，毓師漸次展開後半生的講學生涯，其間易學教材，早期曾採用坊間朱熹與程頤合刊本，後來以自行出版的《易經來註圖解》與《船山易傳》為主。所以，毓師易學偏向於義理易學系統。至於《春秋學》，由於他曾受業於康有為，於公羊學浸潤較深。因此，講學《春秋》時，便常以《春秋繁露》教學，兼亦採用（清）陳立《公羊義疏》與段熙仲《春秋公羊學講疏》。

由於《大易》與《春秋》二經，深具現實精神，最能與時代精神相結合，因此，最符合毓師講學所著重的經世致用精神。他常說：「古人的『學』字含知、行二義」、「中國很少不講知行的學問」、「中國學問，除愛智外，還得行」，所以他很重視「實踐」二字，所謂「治世之道，貴乎行」。毓師由於窮究群經，遍覽百家之學。因此，講經往往融通羣籍以解經，《春秋》與《大易》二經，自不例外。惟本文但就二經的會通著眼，藉以考掘毓師何以在教學上首重此二經，以及其書院取名「天德」、「奉元」的原因。以下各章節即就此一議題，分別敘述。

¹《大易》即《周易》。晉·左思《魏都賦》：「覽《大易》與《春秋》，判殊隱而一致。」見南朝梁·蕭統編：《昭明文選》（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年），卷6，頁25。

²陳綱整理：《毓老師說易經》（成都：天地出版社，2018年），卷1，頁17。

³陳綱整理：《毓老師說易經》，卷2，頁822。

⁴陳綱整理：《毓老師說易經》，卷1，頁4。

貳、《春秋》始元與《大易》始元

《易經》以「元亨利貞」四字開其端，《春秋》以「元年春」三字開其端。兩部經典，都以「元」字為始。由於《易經》以乾卦為首卦，乾者，天也。乾卦「元亨利貞」四字，描述天的四種德性，我們讀乾卦的目的，即在效法天的四德。所以乾卦文言說：「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程頤說：「行此四德，乃合于乾也。」⁵毓師於此也解說道：「《大易》之道，由隱之顯，奉天也」、「《春秋》之道，由顯之隱，返於元也，合天也。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也」。⁶

上述無論是「奉天」（遵奉天道），或「合天」（合於天道），其義一也。都是要我們學習效法天的德性。「天德」雖然有四，但可以一「元」來包含四者。因為，沒有一個元字，就沒有下面的亨利貞。就如同我們也可以一「春」字來包含四季，因為沒有了春生，那來的夏長、秋收、冬藏。但「元」字的義涵，又是什麼？茲列舉先秦兩漢主要的義涵如下：

1. 始也。《說文解字》：元，始也。
2. 善也。《易·文言》元者，善之長也。
3. 大也。《漢書·本紀》：夫基事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
4. 天也。《淮南子·原道》：執元德於心而化馳若神。
5. 本也。《潛夫論·本訓》：必先原元而本本。
6. 首也。《孟子·滕文公下》：勇士不忘喪其元。

從《大易》與《春秋》兩部經典觀察，上述「元」字六種義涵，大抵皆有之。不過，就二經共具的重要義涵，又可歸納如下：

一、慎始防微

《春秋》托始於隱公，並在其即位的第一年，首書「元年春王正月」。如果從歷史的觀點來看，它不過是編年紀事的常法而已，並無特別的意義。但是從經學的觀點來看，它確有內在深層的意涵存焉。正如《周易》以乾元為始，闡明萬化的根源；春秋以「元年春王正月」為始，

⁵黃忠天：《周易程傳注評》（高雄：復文出版社，2014年），頁11。

⁶顏鈺穎、范暘沐：《毓老師講春秋繁露·重政》（臺北：三民書局，2020年），頁104。

先書「元」而後書「春」，乃以「元」統「天」（春者，天時），與乾卦彖辭：「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相契合。其實純以編年紀事而言，沒有必然要用「元年」不可，用「一年」、「初年」、「始歲」……，均無一不可。但是從《春秋》首用「元年」代表國君即位之始年後，歷代史家便相沿成習。甚至於歷代國君年號的始年，也稱元年，並不限於新君即位的第一年。如漢武帝元光元年（134B.C）、元朔元年（128B.C），唐玄宗開元元年（713年）、天寶元年（742年）等等。

至於《春秋》何以取元年來做為國君即位的始年？最早的解說，應屬《春秋繁露·玉英篇》：「謂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者，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輕」。⁷《春秋繁露·王道》也記載說：「《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毓師解說云：「《春秋》這部書，為什麼把元字看得那麼重要？元就是始的意思，本就是大本，是講那大本之正，本正是最重要的，本不正，其末必倚」、「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⁸

何休《春秋公羊解詁》對《春秋》：「元年，春，王正月」的解釋，提出了「五始」之說。此「五始」包含了：「元者，天地之始（天地之本源）、春者，歲之始。王者，人道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⁹何休的解說，自然是受到董仲舒《春秋繁露》的影響。由於慎始，自然就有防微杜漸之意。所以《春秋繁露》頗有許多類似的言論。如：

《春秋繁露·玉杯》：《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¹⁰

《春秋繁露·二端》：聖人能繫心於微，而致之著也。¹¹

《春秋繁露·仁義法》：觀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絕亂塞害於將然而未形之時，《春秋》之志也，其明至矣。¹²

以上諸句，均有防微杜漸、掌握機先的精神。所以，無論在《易經》或《春秋》二書，均以「元」為始，實有慎始之意。《易經》不僅在六十四卦之首卦有慎始之意，在許多卦的第一爻（初爻）也有這種精神。如坤卦初六：「履霜堅冰至」，即在說明防微杜漸，絕亂塞害於未形之意。毓師云：「《春秋》言災異，為防患於未然，不是迷信，是一種警惕，因為懂災異之可怕，

⁷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王道》（臺北：河洛出版社，1975年），卷3，頁1。

⁸顏鈺穎、范暘沐：《毓老師講春秋繁露·重政》，頁283。

⁹唐·徐彥：《公羊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1976年），卷1，頁5-9。

¹⁰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玉杯》，卷1，頁26。

¹¹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二端》，卷6，頁3-4。

¹²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仁義法》，卷8，頁18-19。

就知道防患未然。」¹³這也是《春秋繁露·二端》所說的「貴微重始」¹⁴的精神。

二、長善體仁

元者除了有「慎始防微」的義涵外，另有「長善體仁」之意。真善美為人生追求的三大真諦，中國傳統經典所追求者，即在其中一個「善」字。學習經典不是為了增加知識，而是為了解決人生的問題，安頓我們的生命，進而淑世濟民，造福人群。中國哲人所思所行，無不環繞這一個主題。

《易經》與《春秋》為中國傳統經典，自然相應此一文化特質。所以，《周易·文言》說：「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周易·繫辭》也說：「生生之謂《易》」、「天地之大德之曰生」。

元者，有始生之意，在此體仁，就是體元，體悟天的仁德，上蒼有好生之德。生命是何其的寶貴？沒有任何人可以任意剝奪他人生存的權利。所以，《春秋繁露·天地陰陽》說：

天志仁，其道也義。為人主者，予奪生殺，各當其義。

毓師解云：「天能長物，叫好生。天有好生之德，好生就是不殺。生生不息，天之道。我們好生，也是仁，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天叫好生，我們就叫尊生，所以政叫仁政，行為叫仁行，心叫仁心，方法叫仁術。」¹⁵

毓師云：《春秋》是和《大易》相表裏的，所以在《春秋》經，孔老夫子說了：人人當奉元以養長萬物……元就是仁德的仁。……當奉元以養長萬物，就是當奉仁以養長萬物。」毓師這段話，除了本諸《周易》外，自然也受到何休《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注：「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托新王，受命於魯，故因以錄即位，明王者當繼天奉元，養成萬物」¹⁶的啟發。所以，「繼天奉元，養成萬物」，這不僅是毓門弟子的使命，更是所有知識份子的使命。

參、《春秋》書法與《大易》時義

「時」在經典中具有重要的意義。《中庸》說：「君子而時中」、《孟子·萬章下》稱孔子為「聖之時者也」，可見「時」之一字大矣哉！毓師曾說：「六十四卦，時而已矣。時、節、節氣、

¹³ 顏鈺穎、范暘沐：《毓老師講春秋繁露·二端》，頁100。

¹⁴ 顏鈺穎、范暘沐：《毓老師講春秋繁露·二端》，頁98。

¹⁵ 顏鈺穎、范暘沐：《毓老師講春秋繁露·天地陰陽》，頁382。

¹⁶ 唐·徐彥：《公羊傳注疏》，卷1，頁5。

氣候，完全講自然現象，知時、順時，不違天則，時之義大矣哉！」¹⁷《春秋》書寫與「時」有關者，有三世異辭（所見、所聞、所傳聞）之說。此外，《春秋》中，孔子論及諸侯行事作為，也每每以合時與否，來表達其褒諱貶損之意。所以「時」的概念，不僅《易》之時義，大矣哉！《春秋》之時義，也同樣是大矣哉！

一、《春秋》書法

「書法」者，是指《春秋》的書寫手法。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在撥亂反正，其書寫的方式，則是借春秋時代的史事，來寄寓他的微言大義。但如何借事明義，則是運用各種書法，試舉二例與「時」相關者，如下：

（一）三世異辭

「三世異辭」為《春秋》書寫手法之一。「三世異辭」，最早見於董仲舒《春秋繁露·楚莊王》：

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¹⁸

《春秋》所錄魯國國君共十二世，始於魯隱公元年（前 722），以迄魯哀公十四年（前 481），凡二百四十二年。其間經歷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位君王。而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前 551 年），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前 479）。董仲舒認為魯昭、定、哀三公，為孔夫子所親見的時代，不忍直書，多所隱諱，所以在措辭上是「微其辭」。文、宣、成、襄四公，為孔夫子聞之於父執輩者，同其好惡，所以在書寫上是「痛其禍」。對於隱、桓、莊、閔、僖五公，為孔子得之於史料掌故的傳聞，時代久遠，恩義淡薄，所以書寫上是「殺其恩」。¹⁹

所以，董仲舒所謂的「三世異辭」，是指將春秋所記錄的魯國十二位國君，分成三個階段，在不同階段，孔子書寫時，各有不同的書寫筆法，正如何休所說：「異辭者，見恩有厚薄，義有淺深」，²⁰這是從孔子的時代與《春秋》世次的時間先後，來表達他的褒諱貶損，這完全是出

¹⁷陳綱整理：《毓老師說易經》，卷 2，頁 568。

¹⁸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楚莊王》，卷 1，頁 6-7。

¹⁹殺其恩，是指恩義情感的降等，亦即無較多感情包袱，可以直陳其事，無須太多的隱諱。

²⁰唐·徐彥：《公羊傳注疏》，卷 1，頁 23。

自人性的自然流露。

(二) 合時褒貶

《春秋》除三世異辭外，亦每每以合時、失時與否，來進行褒貶。如：《春秋·隱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按：「賵」為助喪的車馬貨財之屬。《禮記·禮器》與《禮記·雜記下》並云：「諸侯五月而葬」，隱父之父——惠公，雖不知薨於魯惠公四十六年（前 723）何月何日？惟天子贈賵卻遲至隱公元年（公元前 722）七月，由於其父惠公早已下葬，所以《左傳》以「贈死不及尸」批評天王贈賵之「緩」。《公羊傳》亦說：「其言來何？不及事也。」所謂「不及事」，是因為惠公葬事已結束，這時天王派人送來助喪的贈物，經文中有貶其失禮之意，以其不合時宜。

又如：《春秋經·文公二年》：「丁丑，作僖公主。」《公羊傳》：「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其不時奈何？欲久喪而後不能也。」按：父母死後一週年（即第十三個月）舉行練祭（亦稱小祥），並立神主。惟文公卻在僖公死後十五個月始立神主，故有譏文公不時之意。

再如《春秋經·文公九年》：「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公羊傳》：「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²¹按：《公羊傳》認為王者之葬，例所不書。凡書寫的原因有三：一為未到葬期，先時而葬。二為過了葬期才葬。三為魯國派人參與葬禮。除了第三點外，前兩點都與「時」有密切關係。

二、《大易》時義

《易經》的吉凶除了與卦爻主題有關外，亦與各卦爻的「時位」有著密切的關係。所以，《繫辭上傳》說：「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辯吉凶者存乎辭」，辯明卦爻的吉凶，是藉卦爻的言辭來獲得，然而卦爻何以吉？何以凶？自然又必須從卦爻所處的時位來推斷。因此，孔子在《彖傳》中²²，特別強調「時」的重要性，例如：

1. 《乾卦彖傳》：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2. 《蒙卦彖傳》：以亨行，時中也。

²¹唐·徐彥：《公羊傳注疏》，卷 3，頁 17。

²²《易傳》作者，自司馬遷以來，歷代易家均以為孔子所作。惟自宋·歐陽脩作《易童子問》，疑者漸多。不過，《易傳》內容主要為儒家思想，既無法確知其作者，因此，歸功於儒家之開山——孔子，自亦合理。不過，歐陽脩《易童子問》雖疑《繫辭傳》以下非孔子所作，但並未否定《彖傳》、《象傳》非孔子所作。因此，本文仍依傳統說法，將《彖傳》歸為孔子所作。

3. 《大有彖傳》：應乎天而時行。
4. 《豫卦彖傳》：豫之時義大矣哉。
5. 《隨卦彖傳》：隨時之義大矣哉。
6. 《頤卦彖傳》：頤之時大矣哉。
7. 《大過彖傳》：大過之時大矣哉。
8. 《坎卦彖傳》：險之時用大矣哉。
9. 《遯卦彖傳》：遯之時義大矣哉。
10. 《睽卦彖傳》：睽之時用大矣哉。
11. 《蹇卦彖傳》：蹇之時用大矣哉。
12. 《解卦彖傳》：解之時大矣哉。
13. 《損卦彖傳》：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14. 《益卦彖傳》：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15. 《姤卦彖傳》：姤之時義大矣哉。
16. 《升卦彖傳》：柔以時升。
17. 《革卦彖傳》：革之時大矣哉。
18. 《艮卦彖傳》：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19. 《豐卦彖傳》：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20. 《旅卦彖傳》：旅之時義大矣哉。
21. 《小過彖傳》：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上述《彖傳》的敘述，舉凡「時」、「時義」、「時用」，均關係著一個「時」字。孔子特別強調「時」的重要性，於斯可見，無怪乎孟子要稱孔子為「聖之時者也」。從《大易》與《春秋》對「時」的重視，由此發展出來《中庸》的「時中」哲學、孟子的「經權」思想，莫不與之有

關。可見「時」在經典中的重要性。

肆、《春秋》正名與《大易》中正

《大易》的核心價值在「中正」二字，《春秋》的旨義在撥亂反正，兩書的終極旨趣相同。《易·坤六二》文言：「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這句話素為宋代程頤所重視，亦為其治學名言「涵養須用敬」的取法根源。毓師對此，也多所論述。如他在《易經·坤卦》六二：「直其正也，方其義也」，曾解說道：

正，在儒家思想所占的地位重要，「蒙以養正，聖功也」、「各正性命」、「春秋」「大居正」。從正到性命，中間有幾個機？性命，與生俱來的，必要好好養，下「保合大和」的功夫。²³

再如《周易·坤卦六五文言》：「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毓師云：

黃中，講中德在內，正位居體，是正位守體。人啊，得正其位。正位，就是《春秋》所說的「大居正」。²⁴

在這裡毓師引用《公羊傳·隱公三年》：「故君子大居正」，來解說坤卦六五「正位居體」之意。另外，在《春秋繁露·二端》：「吉凶未形，聖人所獨立也」，毓師云：

吉凶還沒有表現出來的時候，正是聖人所獨立的時候。用《易經》的話來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一個人知道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就是吉凶未形，吉凶不能成形了，這是聖人的境界。一個人知道什麼時候應該進，什麼時候應該退，都恰到好處，不失其正的話，還有吉凶嗎？

「中正」二字為《易經》的核心價值，「不失其正」四字，不僅是君子小人的分野，更是聖人所以為聖的鈐鍵。所以，孔子一生追求正名。

「正名」一詞最早見於《論語·子路》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孔子為求正名，故於《春秋》之書寫，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稱之曰「子」；齊、晉雖強，仍稱之曰「侯」；宋、魯雖弱，仍稱之曰「公」，這便是正名的原旨。春秋之際，禮壞樂崩。孔子一生提倡「正名」，希望藉此來重建社會的秩序。

²³大居正，以恪守正道為貴，大者，尊尚之意。

²⁴林世奇筆記：《毓老師講易經》（臺北：中華奉元學會，2016年），卷1，頁149。

以《春秋》三傳言，《春秋公羊傳》最能發揮孔子的正名思想。《春秋公羊傳》以「正」論褒貶例頗多，茲舉例如下：

《公羊傳·隱公三年》：當時而不日，正也。……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

《公羊傳·桓公五年》：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

《公羊傳·桓公六年》：子同生者孰謂？謂莊公也。何言乎子同生？喜有正也。未有言喜有正者，此其言喜有正何？久無正也。

《公羊傳·桓公十五年》：（經：鄭伯突出奔蔡）突何以名？奪正也。

《公羊傳·桓公十五年》：（經：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其稱世子何？復正也。

《公羊傳·閔公二年》：（經：齊侯滅萊）曷為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

《公羊傳·僖公元年》：季子治內難以正，禦外難以正。其禦外難以正奈何？

《公羊傳·僖公四年》：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故也。

《公羊傳·僖公十年》：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

《公羊傳·僖公廿二年》：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

《公羊傳·宣公十五年》古者曷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

《公羊傳·哀公六年》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

《公羊傳·哀公十四年》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

由此可見，《春秋公羊傳》對於孔子「正名」思想的闡發，可謂隨處可見。《春秋繁露·玉杯》：「孔子立新王之道」²⁵，劉向《說苑·君道》：「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君子知周道亡也。」²⁶所以，孔子作《春秋》，乃為明天子之義，非以天子賞罰之權自居，是為了撥亂世，反諸正，使人事

²⁵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玉杯》，卷1，頁19。

²⁶漢·劉向《說苑·君道》（臺北：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景清·王謨刊《漢魏叢書》本，1978年），頁53。

浹洽，王道全備。孔子一生以正名為其職志。孔子作《春秋》寫作動機，即在藉《春秋》來正名，故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以其所正，正天下之所不正。

所謂「正」，自然也要有一定的法則，而不是單憑一己所認定的標準。對儒家來說，所謂的「正」，一切要依於禮，而禮的設計，又必須應乎天理，順乎人心。所以，毓師說：

「《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完全講禮義，自行事言。《易》為智海，『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為義理之學。《春秋》禮義之大宗，以禮義為準。」²⁷《春秋》一切都斷之以禮義，正如《說卦傳》對《大易》的評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所謂「正」，止於一也，一者元也、仁也，仁者無私，仁者愛人，此皆自乾元而出。所以《春秋繁露》說：「惟聖人能屬萬物於一而繫之元也。」²⁸

伍、天人符瑞與群龍無首

無論儒家、道家都追求天人合一。但天人的關係，不是我欲「合一」斯「合一」至矣，而是要有一番漸進的工夫。此工夫首先是透過觀察大自然，進而瞭解大自然，再進而效法大自然，最後達於人與大自然的相應合。簡言之，即經歷了「觀天」—「知天」—「法天」—「應天」四個階段，來達成天人合一的境界。

對於天與人的關係。毓師於《春秋繁露·符瑞》曾解說「符瑞」二字說：「天之所主，與人之所為合也。符，信物也。瑞，祥也、吉也。」又說：

我們都是天的兒子，就叫天子。大家都是天民，就有一個爵位，叫做天爵。我們的德就叫做天德。壹是皆以此為本，都是群龍了，沒有首了，沒有領袖，就吉了，仁滿天下，到這個時候，就是太平世、大同世。²⁹

人人向天看齊，天德無私，我們亦當無私。上蒼有好生之德，我們也要具有仁德。如此，人人都有士君子之行，仁滿天下，人人都是天子（天的好兒子），都平等齊一，群龍無居首爭先，人人都是人中之龍，此即《禮記·禮運》所說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境界。正如熊十力先生所說：

²⁷陳綱：《毓老師說公羊》（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19年），頁99。

²⁸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重政》，卷5，頁11。

²⁹顏鈺穎、范暘沐：《毓老師講春秋繁露·符瑞》，頁86。

全人類和諧若一體，無逞野志，挾強權，以劫制眾庶者，此亦群龍無首。春秋太平、禮運大同，皆自乾元之義，推演而出。³⁰

所謂「逞野志，挾強權，以劫制眾庶者」，這就是霸權。正是孔子所欲除去者。《春秋繁露·符瑞》：「託乎《春秋》正不正之間，而明改制之義。」毓師解說：

改制，改亂制也。亂制者，世及之制也。世及者，繼於人也。新王改正朔、易服色，明繼之於天，非繼之於人也。」³¹

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就是「撥亂反正」，建立新王之制，人人可繼之於天。世代相傳的世及亂制，自禹開始。所以，孟子之時，時人有「至於禹而德衰」之論（《孟子·萬章上》）。另《中庸》說：「仲尼祖述堯舜」，蓋以堯舜乃禪讓之制，是公天下。禹則傳子不傳賢，乃家天下，成其一己之私，此非孔子的理想國度。惟有「天人符瑞」與「群龍無首」，躋世太平，才是孔子心目中的理想世界。

陸、春秋二端與太極兩儀

大自然的事物每每存在兩個不同的面相，如晝夜、是非、善惡、美醜、得失等等，面對不同的面相，如何自處其間，進退合宜，處理得當，此中深有智慧。《中庸》說：「舜其大智也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中者，宜也。用其中，即用其宜之意。舜的大智慧，表現在他對事物的不同層面，權衡其得失，選擇最適當的方式，施之於百姓。這兩個面相，以《春秋繁露》言，可稱之為「二端」，以《易經》言，可稱之為「陰陽」。

《春秋繁露·二端》曾提到：「《春秋》至意有二端，不本二端之所從起，亦未可與論災異也，小大微著分也。」對此，毓師解說：

災異之事，以陰陽為主。那一代都有災異。要是陰陽和合，就沒有災異。兩端就是兩儀，也叫做終始，不是始終。《易經》的兩端，講兩儀；《春秋》的兩端，講終始，終始之道，就包含一切了。³²

毓師又云：

³⁰熊十力：《讀經示要》（臺北：洪氏出版社，1978年），卷3，頁78。

³¹顏鈺穎、范暘沐：《毓老師講春秋繁露》，頁86。

³²顏鈺穎、范暘沐：《毓老師講春秋繁露》，頁93。

《易經》以元為始，《春秋》也以元為始。《春秋》至高之意有兩端，這兩端就是元之用。由元而生兩端，中國的一切都是兩端：好壞、大小、善惡、美醜等等。一切都相對的。元為體、為主。兩端、兩儀就是用。³³

對於《易經》與《春秋》而言，非僅指出事物的兩個面相，其背後更有積極的意涵。《春秋繁露·二端》說：「夫覽求微細於無端之處，誠知小之將為大也，微之將為著也，吉凶未形，聖人所獨立也。」。毓師對此亦解說道：

小大、微著，都是事的兩端。一切事物之生，都是終而復始的。事分小大，理有微著，得研究考究那細微無端之處。無端就是太極，太極就是無端，一個圓也是無端，那無端之處，就是兩端所從起的本、兩端所從起的根、兩端所從起的源。得從根本上研究問題。……要追根究底，找那無端所從起之處，這才是解決根本問題的方法。……只要它有了小的形了，最後一定成為大，只要有微的顯現了，到最後一定著於天下。最後就沒有微、沒有小，一切都在無形之中。……吉凶還沒有表現出來的時候，正是聖人所獨立的時候。用《易經》的話來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一個人知道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就是吉凶未形，吉凶就不能成形了，這是聖人境界。³⁴

由上可知，掌握事物的兩端，進而探究其根源，從根本下手，自然能勝兵於無形。此即《論語·為政》孔子所說的：「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能治乎事物相異的兩面，其害必能止息，³⁵此亦近於《中庸》「執其兩端而用其中於民」之意。而兩端的根源，毓師均歸之於「元」，此元即「天元」，即「太極」，簡單來說，即向天學習，學習天德的無私中正，執簡（天、元、不易）以馭繁（兩端、異端、變易）。

柒、結語

歷史學者每每以《春秋》始元，並無深義，孔子制作之時，未必有什麼指歸，不過後世好事之徒，踵事增華，多所附會耳。甚者，更調解說《春秋》的《公羊傳》是不合史實、一派胡言！因此，我們必須重新對孔子制作《春秋》的動機，加以探討，方能解惑杜疑。

孔子制作《春秋》的動機與目的，可以孟子的話語來探索，以其書就時代與地域言最近孔子，自然最為可信。如《孟子·滕文公下》說：

³³ 顏鈺穎、范暘沐：《毓老師講春秋繁露》，頁 94。

³⁴ 顏鈺穎、范暘沐：《毓老師講春秋繁露》，頁 95。

³⁵ 此章有多種說法，傳統多以異端為不同於聖人之道者，但個人以為「異端」指的是不同的兩端。攻者，治也。即研究事物的不同面相，追溯兩端之源，推測兩端之蔽，則能權衡利弊得失，減少咎害。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

而《孟子·離婁篇下》又說：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從上述二文來看，孔子的《春秋》，確實是有所為而作，文句雖似歷史的陳述，然而孔子作《春秋》，不在記述史事，而是假事以明義，藉以繼王者之迹。《春秋》如何假事以明義呢？歷來學者，多不甚明白，如《春秋》何以始於隱公？眾說紛紜，但皆不得其要。其實《春秋》始於魯隱公，祇是借魯隱之事，以明讓國之義；正如借祭仲之事，以明知權之義；借宋襄之事，以明仁義行師之義。並不在於魯隱真能讓國，祭仲真能知權，宋襄真能仁義行師。孔子之意，不過假事以明義，因而所托之義，與其本事不必盡合，這也是孔子所說的「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也」的涵意。而且《春秋》始於隱公，不無孔子暗中借「隱」字，以說明他作《春秋》的目的，其中實有所寄託，而隱其義於春秋史事中。

《春秋》假託十二公時的春秋史事來欲寄寓義理，確實不是史書，而是聖人之經。第一：孔子撰寫《春秋》之時，魯史自然猶存，孔子本無須多此一舉，另行撰作魯史。第二：撰作《春秋》，本是天子之事，孔子以一介平民，不應越俎代庖，所以，孔子有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之嘆。因此，《春秋》的確是孔子有所寄託之作，我們不能以考訂史事的觀點來研究《春秋》，而應以經學的立場來研究。從經學立場來說，《春秋》三傳中，最能發明聖人微言大義者，當推《公羊傳》。因此，想要瞭解孔子寄寓的義理，捨公羊家的思想，不啻緣木求魚。

《春秋》是孔子晚年寄託其政治思想的著作，其微言大義藉著口授師傳而流傳下來。漢初寫定的《公羊傳》，雖然未必句句皆孔子本意，但是大體上應保留了孔子的《春秋》精神。此外，漢代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何休的《公羊解詁》，也都保留了孔子的許多《春秋》口義。當然公羊經師喜歡揉合陰陽災異讖緯圖書以解經，未必是《春秋》的本意，研究時，自應有所分辨去取。

《左傳》是研究春秋歷史重要而珍貴的書籍，但是闡發孔子《春秋》的旨意，卻不能不待諸公羊經師，《春秋》中許多「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和「非常異義可怪之論」，這些都是不便於時君世主的思想，是不可書見的，惟透過師承師說，口耳承傳，這也是《史記》所說的「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的由來。

《春秋》主要在借事以明義，因此治《春秋》貴在得其義，苟得其義，事可忘也，如果只求史事而忘其義理，那麼只能說是研究歷史，而不是研究《春秋》。正如前面所說的，談到《春秋》何始於隱公？不應拘執於隱公到底賢不賢，真讓或假讓？研究《春秋》張三世之義，不必

疑惑為何世愈亂而《春秋》之文愈治，事義何以相違如此？因為《春秋》不過借某公多少年來說明每世進化的治道。

從上述諸論，《春秋》一書的撰作，實有其特別的目的和用意。因此，我們從《春秋》以「元」字為全書之始，以及託始於隱公來看，都有其經學上的意義，自不能如研讀史書般，等閒視之。雖然，如公羊經師字斟句酌孔子《春秋》的微言大義，在《春秋》一書二百四十二年繁富瑣碎的歷史中，或不免有穿鑿附會的情事發生。然而對於孔子《春秋》的精神，也唯有從公羊學的角度來逆溯，從經學的立場出發，方能真正掌握孔子的政治思想，並重現《春秋》一書的價值，進而賦予《春秋》時代的意義。

《大易》由隱以之顯，《春秋》由顯以之隱，藉由顯明史事表達微言大義，此即孔子「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的用意。毓師生前講授《春秋》，每每援引《大易》以相佐證。透過《大易》與《春秋》兩經的會通，使得兩經旨義，能達到深切著明，相觀而善之效，也使我們藉此瞭解奉元書院所奉、所宗、所學者何事？從上文的論述中，可以清楚明白我們所奉的「元」是「天元（仁）」（在天曰元，在人曰仁），天的仁德表現了慎始（貴微重始）、善良（元者善之長也）、無私（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平等（見群龍無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博愛（博愛之謂仁）、和諧（保合大和乃利貞）。這不僅是毓師追求的目標，也是奉元弟子理當遵守的金科玉律，更是我輩知識份子所應奉持的精神。

參考文獻

一、古籍文獻

- 漢·劉向《說苑》臺北：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景清·王謨刊《漢魏叢書》本，1978年。
- 唐·孔穎達：《周易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1976年。
- 唐·孔穎達：《禮記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1976年。
- 唐·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1976年。
- 唐·徐彥：《公羊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1976年。
- 宋·朱熹：《易本義》，臺北：老古文化事業公司，1984年。
-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大安出版社，2009年。
- 明·來知德：《易經來註圖解》，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98年。
- 清·王夫之：《周易內傳》，臺北：成文出版社，《易經集成》景清道光二十二年守經堂刊本，1976年。
- 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年。
- 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臺北：河洛出版社，1975年。

二、近人著作

- 林世奇：《毓老師講易經》，臺北：中華奉元學會，2016年。
- 許仁圖：《一代大儒愛新覺羅·毓鋆》，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4年。。
- 陳綱：《毓老師說易經》，成都：天地出版社，2018年。
- 陳綱：《毓老師說公羊》，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19年。
- 陳綱：《毓老師說春秋繁露》（上、下冊），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19年。
- 傅隸樸：《春秋三傳比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黃忠天：《周易程傳註評》，高雄：復文出版社，2014年。
- 楊自平：《世變與學術：明清之際士林易學與殿堂易學》，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2年。
- 熊十力：《讀經示要》，臺北：洪氏出版社1978年。
- 顏銓穎、范暘沐：《毓老師講春秋繁露》，臺北：三民書局，2020年。

